

德意志民族的優生學—— 德國種族衛生的起步與初期發展

伍碧雯*

優生學是19世紀中期以後歐洲自然科學界的新興學科，科學家們期許藉由科學技術的精進，得以培育優良的人種。德國於1890年代在普羅茲(Alfred Ploetz)的努力推展之下出現此學科。從發展之初，有關研究課題、研究目的，甚至學科名稱的使用都產生很大的爭議。但是將「優生」(Eugenik)德語化為「種族衛生」(Rassenhygiene)，即已顯示此學科獨特的德意志民族特色。面對19、20世紀之交的歐洲時代變局，德意志帝國正力爭上游，急於證明自身的強權地位，種族衛生提倡者也難以擺脫周遭強勢意識型態的影響，這也使得新興的種族衛生成為與民族主義親近、沾染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學科。而且相較於英國優生學，以純粹科學研究與理論建構為主的特質，德國的種族衛生則明顯重視有效解決國內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民族問題的應用與實踐。德國種族衛生發展初期已呈現的「負面優生學」(negative Eugenik)特質，也為納粹時期具體實踐種族淨化行動揭開序幕。

關鍵詞：種族衛生、負面優生學、人種退化、普羅茲、夏麥爾

* 國立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優生學是 19 世紀中期以後歐洲自然科學界的新興學科，專注於以理性方式操控人類的演化與繁殖，期使人類好的、優秀的遺傳品質能代代相傳，同時以人為方式阻隔、淘汰劣質，以及被認定為不優秀的遺傳品質。因此優生學可說是科學家有意識的介入人類的自然演化過程，並相信藉由科學技術的精進，可達成「人類培育」(die Menschenzüchtung)的目的。¹英國在優生學的發展歷程中拔得頭籌，1860 年代遺傳學者高頓(Francis Galton)不僅首倡優生觀念，而且學派亦逐漸成形。²相較之下德國則是優生學的後進國，其發展較英國延遲了 30 年之久，直到 1890 年代才由普羅茲(Alfred Ploetz)積極倡導。雖然比英國晚起步，但是德國的優生學從發展之初，所討論的課題與發展方向即呈現獨特的德意志民族特色，而非英國優生學的翻版與複製，尤其是英國優生學的重點在於純粹科學研究與理論建構，在德國則明顯轉變為重視有效解決國內社會問題，甚至國家民族問題的應用與實踐個性。³

德國優生學在發展之初，即呈現處理對象、討論課題、研究目的，甚至名詞使用的爭議。直至 1933 年納粹掌權，由國家操控此學科的研究重點，並指示應用與實踐範圍必須完全配合國家的種族政策，這才使得長期的爭議停止。但是這段受納粹主導的歷史經驗，卻使得優生學做為學科名稱蒙上陰影，二次大戰後，德國學術界甚至必須拋棄「優生學」(die Eugenik) 與「種族衛生」(die Rassenhygiene)等 2 個名詞，而改用「人類遺傳學」(die Humangenetik)，並重新調整研究重點，才得以在科學界立足並重新出發。

德國優生學在納粹時期的特殊展現，使得歷史學者必須以 1933 年為研究

¹ 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eds., *Rasse, Blut und Ge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 pp. 15-18.

² 伍碧雯，〈納粹政權對於「無生存價值」德國人的處置〉，《成大西洋史集刊》，第10期(台南，2002.06)，頁289-290。

³ 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2), p. 70.

的切割點，才得以釐清學科發展脈絡。但是這並不表示 1933 年之前與之後的德國優生學發展毫無關連，相反地，多位在 20 世紀初期即提倡優生觀念的德國學者，在納粹時期都已成爲此領域的重量級人物。部份優生學者的研究歷程，甚至已歷經了德國近代史上君主王朝的威廉二世時期(1888-1918)與民主體制的威瑪共和時期(1918-1933)，他們不僅長期主導學科的發展方向與研究主題，而且本身的時代關懷與民族國家立場，亦早已反映在他們的問題意識與學術論著內。在納粹時代來臨之前，他們已經逐漸以民族至上的觀點，雕塑了德國優生學。隨著他們的學術事業在納粹時期之延續，此種觀點也繼續發揚，在服從國家指導，以及完全配合政治目的的情況下，而有更極端的實踐。值得注意的是，部份學者在二次大戰後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還持續其學術生命，並保有崇高的學術地位。

本論文以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期，德國優生學主要倡導者的學術論述爲史料，藉此分析此學科在發展初期，學者們對於學科性質與發展方向的立場差異，以探究學術論辯中所呈現的民族關懷與使命感，以及瞭解此一新興學科如何在發展之初，即形塑爲具有德意志民族特質，甚至成爲民族主義導向的學科，而這也使其成爲日後納粹時期種族淨化行動的預備階段。如果追求免於外力(尤其是政治力)介入干涉的學術研究環境，以及學術研究朝向關懷全人類，是一種理想；而謹慎分辨學術研究理想與民族國家使命之關係，讓學術歸學術、民族立場歸於關懷民族自身，這是研究者應有的基本能力與堅持，那麼德國優生學的發展歷程成爲一個值得批判與反省的歷史實例。

二、種族衛生的名詞爭議與學術推展

(一)以種族衛生取代優生

以「種族衛生」取代「優生」，是德國優生學相異於其他國家優生學的明顯特徵。「種族衛生」一詞首先出現於 1895 年，德國醫師普羅茲的著作書

名《吾輩種族的聰慧與弱者的保護——關於種族衛生之探索及其與人性理想之關連性，尤其是社會主義》(*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Ein Versuch über Rassenhygiene und ihr Verhältniss zu den humanen Idealen, besonders zum Socialismus*)。⁴普羅茲將英、法學術界已使用的「優生」(eugenic)名詞德語化，但是為何特別以德文的 *Rassenhygiene* 取代希臘文字源的 *eugenic*，是否只是單純地因為德文詞彙較易為社會大眾理解？⁵或是普羅茲藉學術名詞的德語化，欲強調此學科的本土性質與民族特質？或者他認為「種族衛生」比「優生」更能精確說明此新興學科的內容？對此他未在任何文章或是演講中解釋。但是另一方面，他卻很清楚的以「種族衛生」區隔當時已出現的「個人衛生」(*die Hygiene des Individuums; die private Hygiene*)與「公共衛生」(*die öffentliche Hygiene*)或「社會衛生」(*die soziale Hygiene*)等概念。他在著作中解釋，「個人衛生」是以個人與家庭所能掌握的自我內部健康衛生為範圍；而「公共衛生」或「社會衛生」則是站在社會與國家之立場，重視所有與個體健康狀況有關的環境與條件，但是「不可混淆社會衛生與種族衛生。社會衛生一直都是以個人之福祉為終極目的，種族衛生則正好相反，是以永續存在的整體之福祉為最終目的。」⁶「整體而非個體，種族而非個別，是普羅茲為德國優生學，也是種族衛生所設定的焦點。

「優生」與「種族衛生」兩個名詞所代表的涵意不盡相同。前者為一中性的詞彙，原意為好的培育，並未指涉集體或是個體；後者則是一個組合名詞，由德語「種族」的複數(*Rassen*)與「衛生學」(*die Hygiene*)結合，此無異於將種族的集體概念，引入衛生學所屬的醫學領域與醫療行為之中。因此「種族衛生」不僅以種族集體為處理對象，並以動態的，甚至是侵入性的清潔淨

⁴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Ein Versuch über Rassenhygiene und ihr Verhältniss zu den humanen Idealen, besonders zum Socialismus* (Berlin: Fischer, 1895), 封面頁。

⁵ 歷史學者 Scharsach 即認為，*Rassenhygiene* 為一德文字，比出自希臘字源的 *eugenes* 更容易為德國人理解。Hans-Henning Scharsach, *Die Ärzte der Nazis* (Wien: Verlag Orac, 2000), p. 25.

⁶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 3.

化行動與醫療措施，處理有關種族集體的健康與衛生問題。其實踐的過程與手段，避免不了在種族遺傳繁殖過程中的淨化處理，例如透過治療、制止、淘汰等方式，達到淨化種族集體的目的。這種想法實已超出傳統醫學以病人的個體治癒為終極目的的醫療行為，進而轉向以集體的種族做為醫療處理的對象；而且醫(診斷)與療(治癒)，不再只具有當下的意義，乃是影響種族集體的未來生存與世世代代的發展。⁷因此「種族衛生」一詞所指涉的內涵，不單純是「科學」、「學術」(die Wissenschaft)的研究，更要求有應用與實踐的動作，也訴求有效之方法與措施(die Maßnahme)，以達成改善種族品質、提升種族價值，並繁殖最理想、最優秀的種族為最後目的。因此相較於「優生」，只模糊表達對於個人或是集體品質的改善，「種族衛生」則完全排除了個體，清楚要求種族集體的品質與數量應有效升級。換言之「種族衛生」比「優生」呈現更具體、更積極、更主動，也更激烈的意義。⁸雖然 1945 年之前，各國優生學也都以民族集體成員為研究對象，但是只有德國的優生學特別轉變以「種族衛生」為名，揭示其聚焦於德意志民族、德國人、日耳曼種族，並企圖清潔、淨化與提升種族集體之品質。⁹

(二) 模糊的種族定義與各自表述的種族衛生

「種族衛生」名詞的出現與日後逐漸頻繁使用，確實為德國優生學形塑了基本形象，因為從 19 世紀末期至 1945 年為止，德國學者所處理的對象大致上均僅限於單一的「種族」(die Rasse)，即「日耳曼種族」、「北方人種」(die Nordic Rasse)或是普羅茲在著作中使用的「西亞利安人種」(die West-Arische

⁷ Sabine Schleiermacher, *Sozialethik im Spannungsfeld von Sozial- und Rassenhygiene: der Mediziner Hans Harmsen im Centralausschuß für die Innere Mission* (Husum: Matthiesen Verlag, 1998), pp. 190-191. 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eds., *Rasse, Blut und Gene*, p. 41.

⁸ 大多數研究德國種族衛生的學術論著中，對於以Rassenhygiene取代Eugenik均未做解釋，美國學者Sheila Faith Weiss有稍加解釋。Sheila Faith Weiss,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OSIRIS*, 2nd series (1987), p. 193.

⁹ 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eds., *Rasse, Blut und Gene*, pp. 93-96, 196-197.

Rasse)。在 19 世紀末，「種族」一詞已是學術圈內、外頻繁使用的熱門詞彙，雖然定義紛雜不清，普羅茲卻還是執意將此字套用在新興學科的名稱上。他積極推廣以「種族衛生」一詞取代「優生」，而且 1923 年德國慕尼黑大學也首先以「種族衛生」為名，設置講座教授，此名詞有進入學術殿堂並成為正式學科名稱的態勢。

然而事實上直到 1933 年之前，「種族衛生」無論做為專業學術名詞或是學科名稱，在德國學術界爭議頗大。主要癥結即在於「種族」一詞指涉的模糊與分類的困難，實在難以給予嚴謹確定的科學定義，而且任何詮釋都容易呈現偏頗狹隘的立場。例如動物學與人類學均使用「種族」，但是對於種族內涵的看法相異，甚至對於人種在自然界的定位也未達成共識；¹⁰醫學領域內，精神醫學、心理學、犯罪生物學、腦部研究、演化生物學……等等學門，也使用「種族」，進行不同種族的生理與心理研究；此外學術圈外的文史工作者，由於不受學院與學術規範的限制，更頻繁運用「種族」，大膽分析與討論各個種族，比較其間的文化發展，甚至認為種族是決定人類文明高低發展的關鍵因素。¹¹而另一方面，歐洲科學研究的傳統，乃以關注全體人類福祉，積極追尋普世真理為最終目標，因此研究的對象應該是不分國界與族群的「人」，那麼所謂的種族研究，如何在科學研究的傳統與理想中找到定位？

面對各方對於「種族」一詞諸多的質疑，曾在瑞士研讀醫學的普羅茲自有一番見解。他認為種族並非只是不同的外在型態而已，種族是持續發展、生機蓬勃、充滿活力的生命整體，其存在是動態且變化，而「人類代代生存所展現的身體與精神特質」——即包含生理體質與精神狀態雙方面的「生機

¹⁰ 直到 1920 年代德國的動物學者對於人種是否可以定位在自然界生命形式中較高的位階，仍未有共識。Hans-Walter Schmuhl, "Rasse, Rassenforschung, Rassenpolitik. Annäherungen an das Thema," in Hans-Walter Schmuhl, ed. *Rassenforschung a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vor und nach 1933*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3), p. 23.

¹¹ 19、20 世紀之交德國社會中，將種族視為人類文明高低發展之關鍵的流行著作例如古比諾 (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的《人種不平等之探源》(*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之德文版、張伯倫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的《十九世紀之基礎》(*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種族」(die Vitalrasse)，才是種族的真正內涵。因此普羅茲視各種不同的種族，各自有其生命的成長、停滯與退化；¹²他指出達爾文也在文章標題中使用「種族」，並將種族視為「為維繫生存而奮鬥與生命發展的整體」，因此無需畏懼或刻意避免使用此名詞。¹³

學術界對於「種族」名詞各自表述的現象，使得種族衛生在朝向專業學科的發展過程中，產生兩種現象：

第一，儘管對於「種族」的見解紛雜，卻不妨礙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學者，以各自對於「種族」內涵的認知，投入實際處理種族衛生問題的討論，並研議方法與措施。19世紀末以來，德國提倡種族衛生的學者，的確來自各種自然科學領域，以幾位初期的提倡者為例：普羅茲擁有醫學博士頭銜、夏麥爾(Wilhelm Schallmayer)是泌尿科與性病醫師，衛生學者果特揚(Alfred Grotjahn)是德國社會衛生學的奠基者、費雪(Eugen Fischer)是解剖學、遺傳學與人類學者、藍茲(Fritz Lenz)的專業是衛生學與遺傳學，並於1923年在慕尼黑大學出任德國第一位種族衛生學講座教授、魯汀(Ernst Rüdin)是精神病學家，也是普羅茲的妹婿、慕克爾曼(Hermann Muckermann)是耶穌會士也是細胞生物學者。¹⁴

第二，因為種族的定義紛雜，因此雖然實質上關注種族衛生的課題，卻避免使用「種族衛生」一詞，而以其他詞彙取代。例如果特揚，雖然極為重視種族衛生所處理的問題，並且認為這也是社會衛生學的核心課題，但是卻

¹² 有關種族的論點，普羅茲在1895、1902與1903年的論述中均有相關陳述，此處引用其1904年之文章。Alfred Ploetz, "Die Begriffe Rasse und Gesellschaft und die davon abgeleiteten Disziplinen,"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1:1 (1904), p. 11. 普羅茲視各種不同的種族，各自有其生命的成長、停滯與退化的解釋，在20世紀初期德國歷史哲學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作品《西方之末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中亦出現。

¹³ 普羅茲在1910年4月德國公共保健總會的慕尼黑大會演講中指出，達爾文的文章標題：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其中亦使用種族一詞。Alfred Ploetz, *Ziele und Aufgabe der Rassenhygiene*, Referat erstattet auf der XXXV. Tagung des Deutschen Vereins für öffentliche Gesundheitspflege zu Elberfeld, (Braunschweig: Druck von Friedr. Vieweg & Sohn, 1911), p. 6.

¹⁴ Hans-Walter Schmuhl, "Rasse, Rassenforschung, Rassenpolitik. Annäherungen an das Thema," p. 26.

排斥「種族衛生」而用「優生」、「生殖衛生」(die Fortpflanzungshygiene)、「智障衛生」(die Idiohygiene)或是「後裔保護」(der Nachkommenschutz)等詞彙。¹⁵他甚至直指普羅茲的「種族衛生」是錯誤的名詞，「這實在不是一個正確而恰當的名稱，而且引起許多人的定義混淆、導致偏見與誤解。令人欣慰的是英國學者高頓所用的『優生』，在德國的使用，驅逐了『種族衛生』」。¹⁶果特揚否定「種族衛生」的原因在於「種族」易產生誤解，而「『優生』所重視且應用於每一個生育、生殖的個體；如果只適用於單一種族，那麼則是掉入民族學的(ethnographische)意義之中。『種族衛生』一詞也許比較恰當在民族學中使用，以便評價民族整體經由內部與外在人口的轉變、移動、與周邊民族的混合、移居等等現象。」¹⁷直到1926年果特揚出版的專論中，仍堅持用「優生」，他說：「我們當然可以給予本民族所具有的北方種族成份，很高的評價……而且以此為傲，但是必須同時強烈堅持，優生是客觀的、是為每一個世代相連的個體所組成之群體的科學，無論這個群體在人種學上屬於哪一個種族」。¹⁸由於果特揚的學術關懷聚焦於個別性的個體，因而排斥「種族衛生」以種族整體為歸屬的研究。

與普羅茲同時期積極提倡種族衛生的醫師夏麥爾，雖然重視全體人類中所有種族的問題，但是也否定「種族衛生」一詞。他認為此應用學科不是處理各種不同種族或是特定某個種族，而應該著眼於所有人類種族的問題，所以「種族」是一個集合名詞，應該以單數 Rasse 表達，因此他拒用 Rassenhygiene，而用 Rassehygiene。夏麥爾於1918年出版的書名為《遺傳與選擇——社會生物學概論與種族事務學說》(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¹⁵ Sabine Schleiermacher, *Sozialethik im Spannungsfeld von Sozial- und Rassenhygiene: der Mediziner Hans Harmsen im Centralausschuß für die Innere Mission*, p. 81; Sheila Faith Weiss,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p. 128.

¹⁶ Fritz Lenz, "Zum Begriff der Rassenhygiene und seiner Benennung,"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4 (1914-1915), p. 445.

¹⁷ Fritz Lenz, "Zum Begriff der Rassenhygiene und seiner Benennung," p. 445.

¹⁸ Alfred Grotjahn, *Die Hygiene der menschlichen Fortpflanzung. Versuch einer praktischen Eugenik*. (Berlin, 1926), p. 10.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¹⁹在書中他直接否定普羅茲的「種族衛生」一詞，認為這會導致每個種族、每個國家都在追尋探究本身種族的純粹性，許多人因此「天真的相信、而非經由科學證實的相信——德國人口由不同種族混合，其中『北方人種』是最精緻的、超越其他種族」。²⁰為了避免這種誤解，夏麥爾直接使用遺傳、選擇、淘汰、退化或是「遺傳衛生學」(*die Erbllichkeitshygiene*)、「種族事務學」(*die Lehre vom Rassedienst*)等名詞。雖然夏麥爾的著作直到 20 世紀中期，仍為德國種族衛生的經典之作，其論點長期為學術圈內、外人士所閱讀與肯定，但是他建議使用的 *Rassehygiene* 一詞，不僅他本人沒有積極推廣，較為年輕一代的學者亦未接續使用。*Rassehygiene* 終究未能取代普羅茲已率先使用，並藉由學術刊物推展的 *Rassenhygiene*。

上述紛爭已久的名詞問題，遺傳學者藍茲則肯定支持普羅茲提出的「種族衛生」，並為文反駁反對意見。他認為「種族衛生」不僅未如果特揚所言在德國被排斥，反而是被廣泛接受，而且連英國的高頓也使用此字，「所以應是無害、無偏頗、且少有誤解的字」。²¹對於果特揚認為「種族衛生」只適合於民族學使用，藍茲反駁：「如果我們接受果特揚的建議，將『種族衛生』以民族學來瞭解，那麼我擔心民族學者根本不知從何下手。因為這些學者迄今並非以『種族』而是以『民族』(*Völkern*)為研究對象。……人類學與民族學均是純理論性的科學，在這種框架之下，如種族衛生這種實踐性質的學科沒有立足的空間」。²²至於「種族衛生」與果特揚在當時已提倡的「社會衛生」之間的關係，藍茲堅信「『種族衛生』絕對不是『社會衛生』的一部份，而且也與『優生』不同……如果我們一定要在『種族衛生』與『社會衛生』之間排序，那麼應該說『社會衛生』是『種族衛生』的一部份，而非相反」。²³

¹⁹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Jena: Gustav Fischer, 1918).

²⁰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p. 1.

²¹ Fritz Lenz, "Zum Begriff der Rassenhygiene und seiner Benennung," p. 446.

²² Fritz Lenz, "Zum Begriff der Rassenhygiene und seiner Benennung," p. 446.

²³ Fritz Lenz, "Zum Begriff der Rassenhygiene und seiner Benennung," p. 446.

至於夏麥爾認為應以「種族事務」取代「種族衛生」，藍茲認為更不可行，因為「種族事務」只表達了「種族衛生」的實際面、生理體質部份，但是「種族衛生」還有抽象的層面——即前述普羅茲強調種族的精神狀態。藍茲進一步為普羅茲的「種族衛生」詮釋，認為此學科是關係到生命整體與種族的多樣性，而且是針對具體存在的多個種族加以研究，並協助找尋其發展與維繫其生存最好、最優良的條件，因此「人們很難找到比這個名稱更好的名詞了」。²⁴

藍茲這種堅持「種族衛生」名詞的適當性與學科獨立的立場，在當時相當特殊。但是在學者們對於學科名稱的持續爭議中，「種族衛生」並未爭取到學術界的共識，甚至名詞的不確定也影響到學術組織的名稱。1905年即已由普羅茲主導成立的「種族衛生學會」(Gesellschaft für Rassenhygiene)，其中柏林分會於1930年的會員大會中，竟然以「種族衛生」的字義容易引起誤會，且已導致學會運作受阻為理由，將分會的名稱改為「柏林優生學會」(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Eugenik)，此行動也引發當時全德國種族衛生各分會的改名風潮，學會的出版刊物內文標題也以 Rassenhygiene(Eugenik)，即「種族衛生(優生)」並列之方式標明。直到1933年納粹掌權後，學會與學報的名稱才恢復。²⁵即使威廉二世時期已成立的「威廉皇帝學會」(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於威瑪共和時期在政府支持之下，1927年新增加「威廉皇帝研究中心——人類學、人類遺傳學與優生學」(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Anthropologie, menschliche Erblehre und Eugenik)，其組織名稱亦避開「種族衛生」一詞，顯見科學界對於種族衛生仍有極大的質疑。²⁶

²⁴ Fritz Lenz, "Zum Begriff der Rassenhygiene und seiner Benennung," p. 447.

²⁵ 在柏林分會改名後，許多「德國種族衛生學會」的分會亦紛紛改名。見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p. 251-253. 在改名風潮之下學報的封面頁也註明為「德意志種族衛生(優生學)學會之學報」，至1933年出版之第3期已取消「優生」字樣，又改回「德意志種族衛生學會之學報」。

²⁶ 「威廉皇帝學會」於1911年1月11日在柏林正式成立。成立之動機來自於威廉二世本身對於科技發展與自然科學的興趣，以及德國科學家大力推動。威廉二世曾援引著名地理學者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觀點，認為在科學研究院與大學之外，應該有一獨立的學術組織，其功能在於

(三) 以學術期刊與社團推展種族衛生

普羅茲不僅將優生改名為種族衛生，並且也認定此學科並非以純粹自然科學研究與理論建構為主，而是要關注社會議題，朝向應用科學方向發展。他積極以種族衛生為名，推展德國優生學的行動，表現在兩方面：首先，在1904年創辦的刊物即名為《種族暨社會生物學文獻——即種族與社會衛生》(*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創刊號之封面頁即言明，此刊物是關於「種族與社會本質及其相互關係之研究，對於生物性條件之維護與發展，以及演化理論基本問題之物種起源學說的刊物」。²⁷但是欲藉刊物之名，使「種族衛生」一詞普及的目的並未達成。以1904年至1909年所刊登的文章為例，其中只有4篇以「種族衛生」為標題，其中2篇為觀察紐西蘭與新幾內亞地區的「種族衛生」，1篇討論國家「種族衛生」，標題還特別註明為「國家優生學」(National-Eugenik)，另一篇則為普羅茲對於「種族衛生」之解釋。²⁸顯然提倡「種族衛生」5年以來，此名詞尚未被學術界廣泛接受。²⁹而刊物中其他文章除了包含種族、退化、遺傳、繁

協調與整合所有學術發展。Max-Planck-Gesellschaft, ed., Dahlem – Domäne der Wissenschaft. Ein Spaziergang zu den Berliner Instituten der Kaiser-Wilhelm-/Max-Planck-Gesellschaft im “deutschen Oxford”, *Max-Planck-Gesellschaft Berichte und Mitteilungen*, Heft 3/93, p. 12.

²⁷ 原文為：Eine deszendenztheoretische Zeitschrift für die Erforschung des Wesens von Rasse und Gesellschaft und ihres gegenseitigen Verhältnisses, für die biologischen Bedingungen ihrer Erhaltung und Entwicklung sowie für die grundlegenden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slehre. 見此刊物之封面頁。

²⁸ 這四篇文章分別是J. Grober, “Ein Praktischer Versuch in der Rassenhygiene (Maori auf Neuseeland),”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3:VI(1906); Alfred Ploetz, “Der Begriff Rassenhygiene und seine Abgrenzung und Einteilung,”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3:VI(1906); R. Pösch, “Rassenhygienische und ärztliche Beobachtungen aus Neu-Guinea,”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5:I(1908); K. Pearson, “Über den Zweck und die Bedeutung einer nationalen Rassenhygiene (National-Eugenik),”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5:I(1908).

²⁹ 從1914年至1915年該刊物的目錄顯示，有較多的學術文章或是評論文章之標題使用Rassenhygiene一詞，顯然「種族衛生」經過十年的發展，Rassenhygiene已漸被德國學術界接受。

殖、傳染疾病、精神疾病……等主題，也有討論關於動物習性與「印度日耳曼族」(Indogermanen)起源的文章。多元的文章主題雖然可解釋為種族衛生具有廣泛包含各類型課題的綜合性質，但是也看出種族衛生內容的不確定與模糊。

其次，普羅茲於 1905 年在柏林成立「種族衛生學會」，成立之初只有 31 名成員，他設定此學會為一個封閉性的知識份子社團，並不公開招收成員，而是以爭取學術人士支持，並立足於科學領域為首要之務，同時要求成員應經常依照生物學與種族衛生之標準，觀察自己的身、心狀況，使自己也成為科學研究的資料，以便日後制訂種族衛生的法則、規範與實踐措施。他也認為學會成員應該擁有可服兵役的健壯體格、在生理與精神層次上必須超越一般人民的水準。³⁰封閉而嚴格的要求，使得此組織被外界視為知識份子的秘密社團，雖然在五年之中已分別在慕尼黑、弗來堡與斯圖加特成立分支學會，但是成員僅達 200 人。

1910 年普羅茲才將學會性質轉變為公開社團，並在 1911 年的備忘錄中重新解釋學會的屬性，「是一個白種人內部的組織……因此今天歐洲的，或是根源於歐洲的文化族群都是我們的研究的領域」，同時有鑑於不同民族的通婚情況增加，所以學會具有「一個清楚堅定的民族意義——即對於自身民族福祉的持續關懷、致力追求一個好的母體基礎，使得種族健康與滋養繁榮，以便民族基礎得以建立。因此學會成員應盡力實現民族的觀點。」³¹普羅茲並且以「新騎士精神」(ein neuer Geist der Ritterlichkeit)稱呼學會的精神，「所有的時代，最高尚的騎士風範就是獻身於一切任務、熱愛人群、保護弱者，但是也要保持自己的身、心之卓越能力，並且為理想任務而戰鬥……理想的任務就是我們必須培育製造身體、心靈、道德上卓越、優美的人類」。³²他認為擁有這種騎士精神者，並非侷限於社會的特定階層，而是分散在社會每個

³⁰ 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p. 201-202.

³¹ Alfred Ploetz, "Erläuterungen über die Ziele der Gesellschaft für Rassen-Hygiene," *Der früheren Denkschrift 4*, veränderte Ausgabe(1911), p. 5.

³² Alfred Ploetz, "Erläuterungen über die Ziele der Gesellschaft für Rassen-Hygiene," p. 7.

階層，「優秀聰慧之人不僅存在於受教育的高等階層，或是有錢的富裕階層，也存在於農民、手工匠、工人之中。在他們之中，有些人極具天賦與精力。我們有許多最好的男人與女人，都是來自於社會底層，反而我們經常發現在城市培育的高級家庭，有些在惡化之中，他們只能藉由人民的原始力量得到更新。」³³顯然擺脫精英的社團形象，朝向社會各階層開放，爭取社會群眾的支持，並具有堅定民族意識的「種族衛生學會」是普羅茲的新理念，成員也躍增為五百人。³⁴

然而並無充分資料可證明在 1911 年之後，「種族衛生學會」的成員確實已涵蓋德國社會各種階層，甚至極有可能還是以中、上階層與知識份子為主。因為隨著 19 世紀下半葉德國持續的重工業化，人口急速聚集大都會與工業地區，其他西歐工業國家正在經歷的社會問題，例如：工人問題、貧窮問題……等等，也出現於德國。這些社會狀況與國家生產力強弱之間的關聯性，成為中、上階層與知識階層關懷的課題。種族衛生提倡者認為，應該教育社會各階層人民，瞭解問題的嚴重性，並且應該認知到人種品質的改良與提升，乃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而實際感受時代問題嚴重性，並且有機會接觸社會大眾，有資格教導人民者，不只是在學院與實驗室工作的科學研究者，也包括有實務經驗的開業醫師。因此 1911 年在德勒斯登舉行的國際衛生展覽，其目的即在於教導社會大眾瞭解人口品質的現況與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未來的可能變化。參與規劃者即以具有醫學教授頭銜的醫師居多，「種族衛生學會」成員亦以個人身份參與。³⁵至 1920 年代為止，種族衛生理念在普羅茲與「種族衛生學會」的長期努力宣揚之下，已在德國獲得許多醫師與醫師團體的認同與支持。普羅茲與夏麥爾本身所具有的醫師身份，也使得種族衛生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對於第一線工作的醫師更有說服力，視之為重要的

³³ Alfred Ploetz, "Erläuterungen über die Ziele der Gesellschaft für Rassen-Hygiene," pp. 7-8.

³⁴ 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 205.

³⁵ 大約有三十一位具有醫學教授頭銜的醫師、二十一位精神病學家或醫師、十二位生物學家與多位人類學者與統計學者參與。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206.

社會使命，這不僅強化了德國種族衛生，以實際解決社會問題為主要的目標，也說明為何日後納粹時期，有關種族衛生的實際執行——種族淨化，有眾多醫師參與投入。

三、負面優生學與學術對手

做為德國學術界的新興學科，種族衛生如何區隔自身與其他已存在類似學科的不同，如何回應來自其他學科的質疑？此種質疑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種族衛生與「種族人類學」(die Rassenanthropologie)有何不同？第二、種族衛生處理的對象與探討的問題，是否遺傳學、生物學、醫學等學科無法涵蓋？種族衛生出現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何在？學術界為何需要這門新的學科？

德國人類學者阿蒙(Otto Ammon)與沃特曼(Ludwig Woltmann)於 1902 年主編的《政治暨人類學評論》(*Politisch-anthropologische Revue*)，在創刊號中闡述該期刊的首要主旨，在於介紹當代自然科學的觀點給社會大眾，一方面使讀者瞭解自然演化學說中關於「植物、動物、特別是人類的有機變化原因與法則、適應性、遺傳、選擇、進化與退化」等知識，另一方面是「從有機自然歷史的角度，研究人類社會與思想，以解釋經濟、政治、法律，以及道德、哲學、藝術與宗教發展上之生物學與人類學基礎」，第三項主旨則是「從已知的社會暨種族衛生、法律與國家觀念、社會政策、教育改革」……等等成果闡明「人種與社會最好、最適當的生存與發展條件」。³⁶比較之下此期刊所接納的文章類別，比普羅茲的《種族暨社會生物學文獻》更廣泛、更多元。以 1905 年整年所刊登的文章為例，其中包括生物演化學說、退化理論、石器時代的種族問題、史前時代的日本、尼采對於演化學說與種族理論的立場，甚至也刊登猶太人問題與猶太復國主義(*der Zionismus*)……等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學術性與非學術文章。《政治暨人類學評論》可視為是當時的科學普及刊物，目的在啟發社會大眾的科學興趣，因此文章儘量符合社會大眾能閱讀的水

³⁶ Ludwig Woltmann, "Ziel und Aufgabe der Politische-anthropologische Revue," *Politisch-Anthropologische Revue. Monatsschrift für das soziale und geistige Leben der Völker*, I:1 (1902), pp. 1-2.

準。而且其創刊時間比《種族暨社會生物學文獻》早，可視為普羅茲的強勁對手，更何況種族衛生的課題也包括在《政治暨人類學評論》的討論之中，種族衛生的倡導者也會將文章投稿於此。

但是如果因此認定種族人類學與種族衛生兩者對於種族的看法一致，或是因此判斷種族衛生隸屬於種族人類學，則是輕忽了種族衛生強調實踐與應用的特性。因為以阿蒙與沃特曼為代表的種族人類學，僅侷限於比較各人種的差異並予以分類，或是評論各個人種所展現的文明、文化程度。例如沃特曼在著作中特別指出金髮、日耳曼種族的天才，乃是促成義大利產生文藝復興的主因，此種學術論點與學術圈外已知的古比諾、張伯倫的種族理論差異不大。³⁷另外沃特曼等人雖然傾向訴求北方人種在人口中的比例提升(*die Aufordnung*)，卻從未提出具體實踐策略，而是注重於理論、學說的建立，或是現象的描述與分析。³⁸相較之下普羅茲等人所倡導的種族衛生，則力求實踐的必要性與迫切性，一方面如同其他國家的優生學，強調以人口、種族的品種提升(*die Aufartung*)為任務，另一方面在選擇健康遺傳品質的同時，也處理淘汰品質不良者。這些都是種族人類學未能觸及的層面。

優生學的實踐即同時包括了選擇與淘汰的雙面性，各國優生學的走向究竟是以選擇優良者為主，朝向處理正面問題——亦即如何使好的、優秀的遺傳特質代代相傳？或是偏重淘汰不良者，以處理負面的問題為主——即如何阻隔所謂劣質、不優秀的遺傳特質繼續繁衍？甚至如何處理已存在的劣質遺傳品質者，也就是20世紀初期德國社會不避諱稱呼的「低價值者」(*der Minderwertiger*)？這完全視各國優生學提倡者的立場而定。

³⁷ 1905年沃特曼出版《義大利的日耳曼人與文藝復興》一書，他認為義大利歷史上能產生文藝復興，歸功於有金髮、身材高大之日耳曼人存在，因為他們是天才，而且百分之85至90的義大利天才均是日耳曼種族。此論點受到社會民主人士柏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的批評，有關沃特曼的反擊，見Ludwig Woltmann, "Arier- Germanen- Rassenpsychologie," *Politisch-Anthropologische Revue. Monatsschrift für das soziale und geistige Leben der Völker*, IV:7 (1905), pp. 386-387. 此文是沃特曼去世後才刊登。

³⁸ 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p. 30.

普羅茲在推展種族衛生過程中，從不迴避「低價值者」的問題，也不排斥討論「安樂死」(die Euthanasie)，他甚至給予相當支持。例如在 1895 年的著作中，他已陳述對於殘疾新生兒的處理方式，「結果顯示新生兒是一個體弱與殘疾的小孩，那將透過公民權團體，由醫師合議團決定，給予緩和死亡，也就是透過少劑量的嗎啡……(父母)不會有很長時間的抗拒感，而是當他們取得繁殖能力證明的許可後，會很高興地再嘗試第二次(懷孕)」，此外他認為在所有兒童疾病中，以腸胃吸收不好與呼吸器官感染最明顯，這是自然的選擇與淘汰，他強調這些新生兒儘管經過醫治，還是會體質衰弱，「最終都成爲負擔」。³⁹普羅茲並非唯一支持安樂死的德國學者，但是做爲種族衛生的重要提倡者，他的言論影響了德國種族衛生朝「負面優生學」(die negative Eugenik)方向發展。⁴⁰藉由這種負面優生學的特質，不僅區隔了當時種族衛生與種族人類學之不同，甚至許多討論課題的敏感性、處理過程所運用的激烈手段，以及可能引發的社會倫理衝突與影響層面，也大大超越種族人類學者所討論的範疇。負面優生學也標示出德國種族衛生重視淘汰、阻隔與淨化劣質遺傳的獨特性，進一步也顯現出德國種族衛生與英國優生學發展的差異。已可預期，在德國的實踐手段與目標，都將比英國更加極端與激烈。

德國種族衛生著重處理的對象－無論稱爲「遺傳品質劣質者」或是「低價值者」，難道是當時德國醫學界所忽視的對象嗎？難道是醫學領域束手無

³⁹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 p. 145, 150. 以上普羅茲在 1895 年支持對於體弱與殘疾的小孩施予安樂死的看法，同一年人類學者阿蒙的文章中則力斥這種方法，「根據這種手法……康德(Immanuel Kant)在強裸之時就應該被毒殺了」，直到 1920 年代末期，還是有學者爲文大力反駁這種以新生兒體質來決定生存與否的方法，並舉出眾多歷史名人在幼年時期均是體質衰弱，例如：植物生態學家 Alexander von Humboldt，更著名的是海倫凱勒(Hellen Keller)。參閱：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p. 38.

⁴⁰ 有關「安樂死」之問題雖非本論文討論之重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1860 年代初期，引介達爾文物種起源理論至德國的生物學者 Ernst Haecke，不僅支持種族衛生，而且也支持「安樂死」，並以歷史上斯巴達人之殺嬰爲例，認爲是有意識的維護遺傳品質。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pp. 29-33, 61-62.

策的病人嗎？德國科學界已經存在眾多學科，何以需要新興學科來處理這些病人？此即前述種族衛生面臨學術界的第二個質疑：學科出現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以德國種族衛生幾位初期的提倡者背景來看，除了夏麥爾為實際開業之醫師、普羅茲擁有醫師身份，但未必真正執業之外，其他人都是以學術研究為主。他們的專業使他們有能力為遺傳品質劣質者、低價值者確定其病理現象，並進行醫學研究、分析、調查與統計，但是對於如何解決這些人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減輕社會負擔？何謂有效的因應對策與措施？這都不是當時遺傳學、生物學、精神病學……等自然科學研究，尤其是醫學研究領域所能提供。已存在的個別學科在解決此方面問題之時，實需要一個整合、溝通的橋樑或平台，以達到實際解決問題的目的。

以 19 世紀以來歐洲精神病學的研究成果為例，法國精神病學家莫瑞 (Benedict A. Morel) 對於精神疾病與遺傳、退化之關連性已有闡釋。他視精神疾病為退化 (dégénérescence) 現象，是人背離了正常、完美的型態，並判斷這種病態會世代遺傳，越來越嚴重，不僅牽連到家族，而且也關連到種族與社會整體。⁴¹莫瑞有關精神疾病會積極遺傳，而且退化會持續發展至完全沈淪終結的論點，被另一位退化理論家馬格儂 (Valentin Magnan) 稍加修正，並結合達爾文的演化理論，認為退化是病態的遺傳現象，應解釋為人從不完美的發展狀態，趨向完美的演化過程中所受之阻礙。兩人的退化與遺傳論點在 19 世紀下半葉，已被德國精神病學界接受。⁴²但是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的精神病學界，將精神疾病視為遺傳性的退化問題，僅能對病人進行觀察、研究、診斷與病因的探究，甚至設法治癒病人。但是如何確實阻斷其遺傳、阻絕其退化、甚至如何移除這種演化過程中的阻礙，並加以淨化，以防止社會、種族的沈淪？後續的問題則必須跳脫純粹醫學研究理論，由新興的應用科學接手，此即種

⁴¹ 莫瑞也表示酒精中毒、社會環境、病態的個性、天生或後天的生理損害、遺傳等都會造成退化。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 47.

⁴² 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 48.

族衛生出現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藉由共同關注人種退化現象，並且研擬有效的解決手段，精神病學與種族衛生得以有合作的機會。積極處理人類生理層次與社會層次的退化狀態，成為種族衛生的重要使命，同時也確定了此學科朝向負面優生學的方向發展。

四、種族衛生提倡者的民族關懷—人種退化與白種人危機

人種退化的課題並非只在精神病學領域內探討，19世紀中葉以後，德國有關退化的論述，已出現於歷史哲學與文化理論之中，其中以華格納(Richard Wagner)與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觀點最著名，廣為人文學術圈熟知，也為世紀末的悲觀論點定調。⁴³但是自從達爾文以科學實證方式建構物種起源論，他的論點即在社會上廣泛流行。其中關於物種的生存與淘汰、遺傳與演化方向等重點，更是人文與自然科學界熱切討論的課題。在19世紀末期達爾文的論點與使用的詞彙，已成為各種學術領域的共同語言與概念，德國種族衛生提倡者也極度推崇達爾文，認為其演化論才是真正以科學方法分析退化問題，因此許多探討種族衛生相關課題的文章，都回溯到達爾文的論點。普羅茲不僅在1895年首部有關種族衛生的著作中，以〈生存競爭與天擇〉為章節標題，1904年《種族暨社會生物學文獻》的副標題也註明是討論「物種起源學說的刊物」(Eine deszendenztheoretische Zeitschrift)。⁴⁴夏麥爾也表示19世紀所有重大的科學進步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達爾文的演化論，他推崇此理論為自然科學開創新的路徑，並且為遺傳與人種退化等現象提出合理解釋的科學理論基礎。⁴⁵

儘管達爾文本人並未特別關注退化問題，而且人種演化是否即是進步的

⁴³ 許多種族衛生學者將尼采視為優生哲學的先驅人物，認為尼采的超人哲學提供優生學發展的哲學基礎。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p. 71-72.

⁴⁴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 pp. IX-XI. 以及《種族暨社會生物學文獻》的封面頁。

⁴⁵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pp. 16-18.

象徵仍值得再議；但是 19 世紀末循著達爾文論點繼續推論之學者，幾乎都認定人種演化即是朝向進化，而人種退化為則是演化、進化中的歧路；進一步擴大申論為：人種退化甚至是民族、社會、文明、文化瓦解沈淪的根本原因。對於人種存續與否的危機感，促使 19 世紀末許多人文與自然科學研究者，積極參與退化問題的討論。在歷史學、人類學、生物學、醫學、文化研究……等等學術領域中逐漸形成重要的課題，甚至也跨出純學術領域的探討，進一步與當代社會流行的思潮呼應、結合。

以負面優生學為發展導向的德國種族衛生，在發展之初，即已正視人種退化問題，而且聚焦於兩個重點——人口數量減少與人種品質降低。人種退化雖然是當時種族衛生的關注點，但是無論以當時或是今日的學術標準來看，這類研究易被視為偽科學與假學術。⁴⁶因為人種退化已是奠基在「種族」與「退化」兩個模糊卻又看似是學術範疇的名詞上；科學界暨缺乏對於種族退化的普遍、客觀指標，那麼就算人體有部份器官退化(例如牙齒、視力)，但是絕對無法解釋為人種的退化現象，更不應誇張解釋為某一人種已面臨全面的生存危機。所謂的人種退化很可能只是臆測，而無法證明真正有退化現象發生。換言之，人種退化很難成為中立客觀的學術研究主題。⁴⁷而種族衛生若要成為一門受到學術界肯定的新興學科，就必須對於人口質、量的升降變化提出經得起反覆檢驗的數據與資料，分析與論述時亦應嚴守學術研究準則，以科學方法、客觀數據與中立論述，爭取其他領域學者的認可，不容模糊處理。藉此證明人種退化現為真實現象，而且已達嚴重程度，否則人種退化將只淪為學者的想像與推測。此外研究者在處理退化、遺傳相關課題時，更應

⁴⁶ Hans-Walter Schmuhl, "Rasse, Rassenforschung, Rassenpolitik. Annäherungen an das Thema," pp. 31-32. 普羅茲在《種族暨社會生物學文獻》的發刊詞中也指出，學術圈內、外均有人以生物觀點研究人類群體的種族本質與社會本質問題，由於涉及到家庭與全體民族之福祉，雖然易引起極大興趣，但不可忽視這類問題也容易具有假學術、偽科學(der pseudowissenschaftliche Charakter)之個性，導致重大影響。Alfred Ploetz, "Vorwort. Unsere Ankündigung,"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1:1 (1904), p. III.

⁴⁷ 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p. 82-83.

力求與非學術性、社會流行思潮的區隔，讓學術歸學術，意識型態歸意識型態。如能達此程度，就算是以所謂「負面優生學」做為種族衛生的另一個稱呼，也絕不是對此學科的負面評價。另一方面不確定的「種族」與「退化」概念，卻使得此課題具有極大的自由解釋空間，也更容易與其他非學術概念、社會流行的意識型態結合，例如 19 世紀已興起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日耳曼種族意識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等。⁴⁸

近年來多位研究德國醫學發展的學者在檢驗相關歷史文獻後，均認為在 19、20 世紀之交的德國，種族衛生提倡者與其他領域的知識份子同樣面對時代變遷與挑戰，例如：在德國的工業發展快速，都會規模迅速擴大之下，社會階層間之緊張感層出不窮，而遲來的政治整合與統一，使得德國做為歐洲民族國家的後起之秀，既急切於在國際政治上肯定自身的強權地位，又急切催促德意志人民產生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政治、社會與民族地位的急速轉型，都牽引著德國知識份子的學術思考與時代關懷。將種族衛生的提倡與自身民族、國家、社會的關懷結合，是否違背應用科學以實踐為目的的宗旨，值得再議，但確實容易打破客觀、中立的學術界線與堅持。19 世紀末德國的種族衛生提倡者，不僅幾乎以德意志民族、日耳曼種族為單一研究對象，並經常在學術論述中呈現強烈的民族使命感，期望自身民族、種族在當代有最高、最卓越的成就表現。隨著 1914 年大戰的爆發，出乎意料之外的長時間作戰、全體總動員與巨大的戰爭規模，更加深他們對於民族的生存危機感，以

⁴⁸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將達爾文的物競天擇學說，套用在社會與政治現象上，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並不是意外，而是由不可轉變抗拒的自然法則在主導，此即優勝劣敗，而人類社會也如同動物世界一樣，強者展現高超的文明，並且理應控制弱者。社會達爾文主義並非出自德國，但是此理念的激烈化卻是在德國展現，19 世紀中期生物學家 Haecke 簡化並進一步詮釋達爾文的論點，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德意志地區的流行奠定基礎。Gehard Baader, "Rassenhygiene und Eugenik – Vorbedingungen für die Vernichtungsstrategien gegen sogenannte 'Minderwertig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Johanna Bleker and Nobert Jachertz, eds. *Medizin im Dritten Reich*, (Köln: Deutscher Ärzte-Verlag, 1993), pp. 36-37. 德意志民族主義是指以德意志民族為主體，而興起的民族意識型態。此意識型態強調德意志本土文化的優越，並對其他民族採取抗爭、對立與不寬容的戰鬥與侵略態度。19 世紀中期興起，以對抗法國為主，至德皇威廉二世時期已逐漸摻入種族意識型態。Konrad Fuchs and Heribert Raab, eds. *Wörterbuch zur Geschichte* (München: C.H. Beck, 1996), pp. 543-544.

及對於種族質、量下降的焦慮。直至 1920 年代，德國的醫學界人士與種族衛生提倡者已呈現「就算不是非常的政治取向，卻絕對非常的德意志取向」。⁴⁹藉由普羅茲與夏麥爾有關人種退化與混種的討論文章，以及戰爭對於人口質與量之影響等論述，可考察德國種族衛生發展之初，提倡者的政治關懷深度與民族主義立場，亦可檢視社會流行的意識型態對於著重實踐的應用科學之影響程度。

(一) 法國人種的退化與德國的警訊

以普羅茲 1895 年的著作所呈現的論點為例，他認為要提出人種退化的確切證據十分困難，但是可以間接由人口數與出生率來舉證一個民族、一個種族的退化：「我們傾向相信有一個輕度的退化存在，特別是像法國人，由於他們的出生率減少，使得他們的社會鬥爭能力變得遲鈍了」。⁵⁰普羅茲指出，法國自 1890 年開始，人口死亡率大於出生率，人口開始呈現負成長，這已是退化的明證。綜合其原因有三：結婚人數減少、平均生殖力下降、節育(包含墮胎)現象升高。其中他認為，法國人生殖力的減弱不能歸咎於文明進步與物質豐裕，因為「其他國家也同樣的富裕與文明化，但是人口成長，例如英國與德國……而且法國勞工的生殖力還不如德國的小市民」；「法國已是停滯的種族，雖然他們生活於豐富的物質條件之下，但卻退步了，外來移民者的後代替補了他們的名字，卻不能替補他們的種族。」⁵¹

普羅茲認為法國人口減少，肇因於過去 1 世紀法國人體質逐漸退化與生殖力退步的交互影響，他判斷此現象完全是歷史事實所造成。因為 1789 年法國大革命開啓了歐洲政治動盪時代的首頁後，從 1791 年至 1813 年，法國共有 4,556,000 男性從軍，他們作戰、受傷、精疲力竭而歸鄉，就算努力建立家庭，

⁴⁹ Hans-Henning Scharsach, *Die Ärzte der Nazis*, p. 16.

⁵⁰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 128.

⁵¹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 1.

還得為生計、生存而奮鬥，體質差的夫妻如何生育好的下一代？⁵²普羅茲雖然在論述中雖舉出數據，但是在解釋上卻是根據歷史印象，例如：19世紀末的法國，不僅沒有繼續製造類似18世紀末大革命的震撼行動，甚至在1870年還被普魯士軍隊擊敗，戰敗的法國顯然已成為弱者，更是人種退化的實證。他在書中將衰弱失敗的法國與種族問題連結：「法國是歐洲亞利安種族所建立的國家中，唯一的例子，其他國家都快速成長」，法國是亞利安種族中唯一正在退化的實例，而其他歐洲、美國與澳洲，這些都是「歐洲亞利安人及其後代所建立，即西亞利安人，都呈現快速的人口成長，事實就在眼前，在偉大種族之中，亞利安人獲得文化種族(Culturasse)之名聲，實至名歸，值得慶賀。」⁵³

以人口成長停滯與戰敗為由，將法國視為沒落種族的例證，多次出現在普羅茲的文章與演講之中。1910年他在慕尼黑的德國公共保健總會大會上，以「種族衛生的目標與任務」為題發表演講，其中也提到：「雖然法國人迄今減少不多，他們已經長期的人口停滯，而我們德國人自1871年以來，已超越他們兩千萬人了。但是德國人與英國人，以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出生人數也緩慢減少，如果情況沒有轉變，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就面臨東歐人與亞洲人越來越快速的移民潮了。」⁵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法敵對，這類以法國人口減少為退化例證的說明，也在德國種族衛生學會的公開呼籲中出現，刊登於《種族暨社會生物學文獻》中：

法國在過去一世紀不良的人口政策，影響到他們的未來。十八世紀末，法國是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今日他們的人口數只比德國的七分之四多一些。如果這場戰爭我們只對抗法國一個國家，就算法國士兵再厲害，結果也可想而知……以前法國是小孩少而富裕程度增加，但是現在他們的富裕喪失，肇因於小孩太少。⁵⁵

⁵²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p. 65-70.

⁵³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 78.

⁵⁴ Alfred Ploetz, "Ziele und Aufgabe der Rassenhygiene," p. 13.

⁵⁵ "Aus der Gesellschaft für Rassenhygiene . Aufruf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Rassenhygiene,"

普羅茲的說法使得國家、民族人口數量的增減，成為種族衛生領域中，判別種族進步或退化的重要指標。而人口數據則象徵了當時代歐洲各民族國家國力強弱的排行榜，或者被排擠於強權名單之外。儘管他是藉由真實的法國人口減少，以說明人種退化問題，並向學者們提出警訊，但是其論點中，也將生物界物種優勝劣敗的場景，轉移至現實的人類世界。因為法國已是軍事上的戰敗者，經濟富裕的沒落者，足以證明是不優秀的退化者。相較之下德國是戰勝者、人口增加，已證明為是適合生存的優秀者與統治者。將德國人口眾多所象徵的強盛與富裕，對比法國民族貧困與衰落，這種表達可謂以種族衛生關注的人種退化課題為外衣，卻包裹德意志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心態。

普羅茲強烈而清楚的日耳曼種族意識與白種人優越感，也藉由種族衛生之論述表達，這可由他所使用的「日耳曼」(die Germanen)一詞看出。他將「日耳曼」視為種族也是語言的族群，日耳曼人種與語言分佈於三大地區——斯堪地那維亞區、德意志區、盎格魯薩克遜區。⁵⁶他根據人口成長數據判斷：「在全世界中，西亞利安人快速超越其他種族，日耳曼種族快速超越其他非日耳曼的西亞利安種族，而英格蘭人超越所有其他日耳曼人」。⁵⁷此外他也認為英格蘭人擁有最高的腦容量，而所有日耳曼人的腦容量平均值，都高於非日耳曼人；從識字率、教育水準、國家行政效率、藝術與學術文化成就來檢測，則「斯堪地那維亞人、英格蘭人、德意志人與北美洲的白人都站在決定性的高點」，都是文化高超的民族。相對地羅曼語系與斯拉夫語系國家的人民，則讀、寫能力缺乏，因此「當日耳曼文化在歐洲正是繁花盛開之際，羅曼語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5 (1914-1915), p. 706.

⁵⁶ 普羅茲分析日耳曼人種分散為的三大語言族群與地區：第一、斯堪地那維亞人—瑞典、芬蘭、挪威、冰島、丹麥與北什列司威；第二、德意志人—德國、尼德蘭、比利時的一部份、瑞士、奧地利—匈牙利、俄羅斯；第三、盎格魯薩克遜人—不列顛、愛爾蘭、英屬北美、美國、紐西蘭與澳洲。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 81.

⁵⁷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 85.

系與斯拉夫人呈現明顯的停滯」。⁵⁸普羅茲已將自然科學界對於人口數、人種體質與人種退化的討論，延伸至判斷文化與文明發展的高、低程度。在論述中甚至對於英格蘭人的稱讚與推崇，超越了對自己的祖國—德意志帝國的讚美，他特別指出「人類學家龍布羅梭(Lombroso)也認為英格蘭民族是歐洲發展最高等的民族」。⁵⁹

從人種退化討論過程中無可迴避的種族混合問題，亦可檢視種族衛生提倡者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普羅茲毫無保留的讚揚「白種人」(die Weißen, die weiße Rasse)的優越。但是所謂的「白種人」，他界定包括了北方人種(die nordische Rasse)、阿爾卑斯人種(die alpine Rasse)、地中海區人種(die mittelländische Rasse)與猶太人種(die jüdische Rasse)。他表示，雖然當時多位知名的學術圈內、外的學者均認定只有白膚、金髮、藍眼、高大，並擁有所謂堅毅臉龐的人，是所有白種人之中，身、心最精緻的典範，但是他反而認為這種看法並非學界的共識，「此問題迄今仍無解」。⁶⁰

在 1910 年德國公共保健總會的演講中，他承認種族在長期的形塑過程中，勢必會與其他種族接觸混合，但是如果混合時謹慎挑選近似的種族，而且數量管制，則不會對於種族本身有太大改變。他也承認，「科學界迄今仍無法確定人種是否都具有同一生物性，也無法確知幾個較大的人種——白種人、黃種人與黑種人，彼此之間的繁殖是否會造成損害，以及彼此之間是否可能取代對方」。⁶¹在此普羅茲以科學界尚未有定論為由，先對於混種問題的表達其模糊立場。但是在演講的中段開始，他的立場則明顯轉趨明顯，他以美洲境內的黑白混種為例，認為：「黑種人與白種人混血的第一代，可以確定其心靈與身體，尤其是個性都是惡劣的素質……至於白種人與黃種人的混血兒如何，目前還毫無所知」；「在過去數百年之間，白種人經歷了前所未有

⁵⁸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 134.

⁵⁹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 135.

⁶⁰ 在此普羅茲所指的多位學術圈內、外的知名學者包括：Gobineau, Lapouge, Retzius, Darwin, Woltmann, Wilser, Weinberg 等。Alfred Ploetz, "Ziele und Aufgabe der Rassenhygiene," p. 27.

⁶¹ Alfred Ploetz, "Ziele und Aufgabe der Rassenhygiene," p. 12.

的劇烈增長，而黃種人又比黑種人強，所以我們真的可以承認有人種提升，我們應該有權這麼說，白種人可以被視為最高發展，接下來的順序是黃種人，而黑種人則排在最後面。」⁶²

普羅茲簡短舉出三項實例說明白種人的優越與極致：「白種人的民族製造了最棒的天才，而且站在今日文化的頂峰」；其次，白種人有不同於猿猴、不同於「最低等的人種類型」(der niedrigste Menschentyp)之臉部與頭顱結構；第三、根據醫學界對於血清的研究，白種人擁有最複雜的血蛋白。⁶³普羅茲建議白種人應該避免與「低價值的人種」混血，「就算混血兒並不比他們的父母差，卻還是令人疑慮擔心，因為他們的水準還是低於白種的父母」。他也提出警告：混種問題不僅發生在美洲的黑、白人種之間，在莫斯科、聖彼得堡與華沙也都有快速成長的中國人聚集區，「他們乘坐西伯利亞鐵路到達西方，他們的前鋒部隊已到達柏林，在那裡最近就有一個中國洗衣工人的小聚集區形成」。⁶⁴普羅茲的歐洲、白種人優越意識型態明顯可見。

(二) 白種人的生存危機

相較於普羅茲清楚的民族主義與日耳曼種族意識的論述，同一時期關注種族衛生問題的夏麥爾，則力求以客觀與中立的立場討論種族衛生。他在世界大戰將結束之際出版的論著中，嚴厲駁斥了當時有關北方種族優越性的說法：「在德意志民族之種族基礎中增進北方種族成份，這不屬於優生的計畫」。⁶⁵他批判當代德國種族衛生提倡者具有強烈的種族偏見，誤認為北方種

⁶² Alfred Ploetz, "Ziele und Aufgabe der Rassenhygiene," pp. 17-21.

⁶³ 普羅茲在演講中僅簡短提到以上3項重點，他表示由於演講時間有限，無法對此3點再深入說明，因此並未詳述哪些是「白種人中最棒的天才」？至於「最低等的人種類型」，他指的是澳洲的原住民(Australneger)。有關白種人的血蛋白問題，他借用猶太裔德國梅毒與皮膚科醫師Carl Bruck於1907年發表有關猿猴與人種血液分析比較的觀點。Alfred Ploetz, "Ziele und Aufgabe der Rassenhygiene," p. 17.

⁶⁴ Alfred Ploetz, "Ziele und Aufgabe der Rassenhygiene," p. 25.

⁶⁵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 p. 375.

族成份比所有其他種族都高級，甚至是最高級；而且隨著這種偏見的價值判斷，進而要求對人民進行以北方種族為主的種族衛生之處理。夏麥爾認為，「這些價值判斷與這些訴求，均來自於對學術研究完全不嚴謹的法國貴族古比諾之理論」。⁶⁶他表示，許多欣賞古比諾種族論點之德國人，其實都是支持貴族與精英想法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份子，他們是社會上的特定階層，熱愛古比諾所代表的保守、反動想法，因為這是貴族階層的象徵；而閱讀古比諾作品的同時，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是北方種族的成員，認為自己的遺傳因子中有大部分屬於這種高貴、特殊的種族，但是他們其實並不欲真正深入瞭解種族問題，而只是想要享受屬於特殊社會階層所帶來的共同歸屬感。⁶⁷

夏麥爾進一步藉由混種問題的論述，反對北方種族優越至上的說法。他認為混種是歷史的自然現象：

德國與中歐各地區的人民是由難以釐清的種族混合所組成……在歐洲，古老的原始種族與從屬的種族(Unterrassen)自數千年以來一再地混種……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在全德國沒有一個人可說是純北方種，或是純阿爾卑斯種，或是有一個沒有被混合的後代可以稱為純『原始種族』……比較接近事實的是，每一個德國人，甚至也許是每一個歐洲人，都是種族混血兒……所謂北方種族比其他種族具有較高的文化天份，而且藏在德國混血兒中，甚至認為只有他們才有文化創造天份，這些都是不可知也無法證實，甚至根本只是臆測。⁶⁸

他呼籲種族衛生提倡者應該摒除偏見，以無私的態度探索問題：

為北方種族做宣傳……削弱了我們德意志整體意識，而且無助於我們提升在國外的受歡迎程度與名聲……我們有一切的理由認為，種族衛

⁶⁶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pp. 375-376.

⁶⁷ Sheila Faith Weiss認為，1933年之前德國的種族衛生學重視階級問題甚於種族問題，許多種族衛生學者都是中產階級的背景，他們的論點也帶有中產階級的偏見。Sheila Weiss,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p. 195.

⁶⁸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pp. 377-378.

生的學說與宣導要和那些充滿偏見、專斷的教條，以及那些極端傾向頌揚北方種族的政治人物保持距離、劃清界限。⁶⁹

夏麥爾批判社會逐漸流行的種族意識型態滲入種族衛生領域，他建議的矯正之法是避免比較種族與種族之間的不同，轉而重視個別種族內部的問題，這也完全符合他一貫使用 *Rassehygiene* 而不用 *Rassenhygiene* 一詞的立場。

夏麥爾堅持種族衛生應處理單一種族的態度，確實使他的論點不像普羅茲呈現炫耀與侵略色彩的日耳曼種族意識。但是世界大戰的劇烈破壞與震撼，卻使他無可避免地憂慮歐洲白種人是否陷入了高度的生存危機？白種人在人口質與量方面是否有嚴重退化現象？

我們經歷這場就在我們身旁的恐怖戰爭，使我們特別注意到國際間，對於人民體格之強健與維護的條件。每一個參與戰爭的歐洲國家，一定都會長期感受到恐怖戰爭導致人口數字的削減與種族聰慧的降低。從種族競爭的角度來看，長期以來在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持續升高的實力較勁，經歷這場戰爭後，無論就軍事與經濟層面，甚至在生物層面來看，都轉變為十分不利於白種人。

夏麥爾認為，其實早在 1887 年非洲阿比西尼亞(Abessinien)戰勝義大利軍隊一事上，已顯示歐洲實力的下衰；而「日本戰勝俄國，更是世界歷史的轉捩點。相較於地球其他地區的人，歐洲的強權優勢已在消失之中。」⁷⁰在著作中對於即將來臨的「黃禍」，他憂心忡忡，「目前黃種人的人口數與勢力都在成長，這對我們的未來不能說不是危險的生物競爭……如果開放讓黃種人自由移入，對於每一處白種人的居住地不僅是危險，而且幾乎可以確定是白

⁶⁹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p. 386. 夏麥爾在此所說的「極端傾向頌揚北方種族的政治人物」，根據書中頁 385 與頁 386 的註釋可看出是指藍茲、魯汀……等學者。

⁷⁰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p. 495.

種人會逐漸被黃種人生物性的驅逐。」⁷¹面對白種人的生存危機，他呼籲歐洲各國團結整合，一致對外，同時應該注重操控人口質與量的發展，否則「白種人最好的時代將過去，白種人會喪失人類的文化領導力量。」⁷²相異於普羅茲將德、法兩國勢不兩立的民族主義立場呈現於種族衛生之論述，夏麥爾則為新興的種族衛生，澆灌歐洲白種人為中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

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對外合理化民族國家以戰爭勝利，證明軍事上勝者優、敗者劣，以及白種人文化層次高，非白種人文化層次低的心態；對內也合理化社會中、高階層者優，而低階層者劣，甚至市民與知識精英階層者優，勞工、非知識階層者劣的看法。⁷³如果普羅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論點，是以法國軍事失敗與人口數降低的事實表述，夏麥爾則呈現在討論社會內部個體的疾病抵抗力與遺傳體質問題上。他認為，每個人因其遺傳體質之不同，對於疾病抵抗力亦有差異，而疾病抵抗力較弱者，代表其遺傳體質較差，屬於「下等的階層」(die untere Stände)。這些個體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就是缺乏優秀遺傳體質的退化者，他們透過不停止的生殖行為製造下一代，不可避免將會導致整體社會人群在選擇、淘汰過程中，朝向退化與惡質方向發展。

夏麥爾舉證的社會事實例如：賣淫者本身即感染性病，也傳播性病，而酗酒者本身即酒精中毒、體質衰弱，此二者不僅造成社會問題，也是道德問題，甚至更嚴重的顯現出遺傳缺陷與退化。他因而質疑政府以社會福利政策照顧或是醫治這些人的必要性何在？⁷⁴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如果有利於這些「下等階層」，那麼同時也要為社會群體的退化、惡質化負責。夏麥爾的種族衛生論點以重視單一種族內部的個體為其特色，因此他也認為這些傳播性病、體質差的個體，應該為社會整體的退化負責。而且這些具有遺傳缺陷的

⁷¹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p. 496.

⁷²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p. 501.

⁷³ 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pp. 74-75.

⁷⁴ 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p. 124-125.

個體，在德國工業化與都會化過程中，特別存在於勞工階層，即「下等階層」中。⁷⁵他在書中強調：

只要我們還無法根據個人履歷表中，遺傳登錄的項目來評估人，我們就必須以生產狀況的展現為衡量標準，進行判斷。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說人的種族價值(*der Rassewert*)與人的類別(*die Personenkategorien*)，在此時是根據『現象類型』(*der Phänotypus*)，也就是根據每個人的發展結果，以及每個人的成就來判定。⁷⁶

換言之，每個人的工作性質與職業類別，不僅決定了其社會地位，也呈現了其生物價值與種族價值；擁有高的社會地位，即是高的社會價值，也象徵具有優越的種族價值與種族地位。

夏麥爾將種族衛生領域內有關體質退化的討論，應用於解釋社會上賣淫者與酗酒者存在的現象。呈現了當時高雅、乾淨、有知識水準的中、上階層，對於社會底層中所謂低社會價值者、劣質者，製造了道德退化與體質衰敗的指責。這種體質退化與道德退化相互影響的論述，在當時是許多種族衛生提倡者的共同看法。他們一方面站在應用科學的立場，希望找出能夠同時解決生理與道德兩種困境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站在中產階層、市民階層的社會道德觀與生存優勢立場，批評被認為只發生於社會底層的賣淫、酗酒與犯罪等社會現象。這也呈現出種族衛生提倡者的另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立場。⁷⁷

值得注意的是 19 世紀末已在德國社會出現的反猶主義，或是貶低猶太人、猶太民族、猶太種族的言詞，並未出現在普羅茲或是夏麥爾的論述中。⁷⁸夏麥

⁷⁵ 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 125.

⁷⁶ Wilhelm Schallma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p. 428.

⁷⁷ Peter Weingart, Jürgen Kroll, and Kurt Bayertz, *Rasse, Blut und Gene*, p. 48-49, 124.

⁷⁸ 「反猶主義」(*Antisemitismus*)一詞為1879年德國作家Wilhelm Marr開始使用與傳佈。此意識型態綜合了西方歷史上，基督教長期敵視猶太教而產生的仇視猶太人現象、前述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與19世紀以來西方科學研究中有關種族論述所產生的偏差見解，因此「反猶主義」者自認以宗教、文化、種族三重理由合理的拒斥猶太人。Konrad Fuchs and Heribert Raab, eds. *Wörterbuch zur Geschichte*, pp. 49-51.

爾嚴斥北方種族優越至上的偏頗觀念，連帶使反猶思想在他的著作中毫無出現的機會。而普羅茲甚至在 1895 年的著作中，肯定猶太人是「僅次於」西亞利安人發展最高的文化種族。雖然歐洲猶太人是過去數十年中，人口增加最多的種族，但是他表示，「歐洲猶太人現在既不是一個整體的種族，也不與古老時期的猶太人有深刻的同源關係」，因為他們在千年以來，已經過強烈的混種，在巴勒斯坦與小亞細亞地區，密集地與印歐民族(*der Indogermanische Volk*)，也可能與蒙古種族混合。⁷⁹他引用龍布羅梭的說法，認為真正具有閃族血統的猶太人，只有百分之五而已，「而種族的對立性已煙消雲散，這告訴我們，猶太人的亞利安血統多過於閃族血統」，強烈的混種已使得猶太人外貌改變，與所居住地區的居民相貌相似。⁸⁰他也推崇猶太人在人類歷史上的貢獻，例如耶穌、斯賓諾沙、馬克思……等等；尤其當拜占廷文化沒落時，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成為自然科學與醫學知識等學術守護者與繼承人，「當今在學術界、藝術界與公共生活中，猶太人的優越表現，我們不能忘記」。⁸¹普羅茲反對人為的區隔猶太人，他認為猶太人應被同等看待為「高等的文化種族」(*hoch stehende Culturasse*)，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互相融合，都會使雙方精緻化，對於雙方都有最大的好處。普羅茲也從生物學角度預言，社會上的反猶思潮會消失，「幾乎所有的生物學家都承認，相近種族的混合，是使得種族聰慧提升之方法，也是好的變種之來源……整個反猶主義會消失無蹤，它的餘波，在自然科學認知與人類民主的潮流之中，會逐漸消散」，因此他也呼籲猶太人，面對社會上這股反猶思潮，不需要以提倡自身的民族主義來應戰。⁸²

五、 結語

19、20 世紀之交的德國種族衛生提倡者，均同時扮演多重角色，無論身

⁷⁹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p. 137-138.

⁸⁰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 138.

⁸¹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 141.

⁸² Alfred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pp. 141-142.

處學術圈內或是圈外，他們一方面力求成爲專業、冷靜的科學研究者，進行以種族爲名的各種分析與研究；另一方面卻又是激昂的民族主義份子，憂心日耳曼種族的退化，熱切關懷德意志民族國家、社會的生存與未來。因爲他們相信自身所屬的德意志民族、日耳曼種族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領航員，在大時代中具有特殊的定位與身負拯救文明的重責大任。但是既擺脫不了外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也就難以在科學的客觀與個人的主觀之間清楚切割，甚至容易將二者混合，而冠上科學實證之名，則進一步強化了狹隘與侵略特質的意識型態。尤其深染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後，更爲 20 世紀德國政治、軍事、文化與經濟層面的種族競爭、優勝劣敗的行爲塑造合理的科學背書。⁸³普羅茲的論點中經常種族、民族不分；夏麥爾也頻繁使用定義模糊的白種人，19 世紀末德國社會盛行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與種族意識，顯然侵蝕了應該嚴守學術準則的種族衛生領域。不待納粹出現，德國種族衛生在發展之初，即已藉由這些不精準的用詞，成爲深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新興學科。

就德國優生學發展的歷程而言，無論稱爲優生學或是種族衛生，此學科可謂是學術圈內、外「有志之士」的共同營造。而且不可否認，在關鍵用詞、組織推廣，甚至思考模式與實踐對策方面，身處於學術圈外的提倡者，在學科形塑的初期階段，主導性極強，也提供了絕大多數的想法，指示了發展方向。20 世紀初期，普羅茲與夏麥爾都未在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任職，從嚴格標準來看，他們並不屬於學術界的圈內人士，因此要求其著述與論點應依嚴謹的學術準則發表，並非其義務，更無約束力。但是他們有關種族衛生的論點、組織社團與編輯刊物，在此新興學科朝向應用科學發展之際，確實具有奠基與指導的重大影響力。然而他們本身所持有的意識型態，也是導致此新學科呈現特殊德意志特色的主因，顯然在 19 世紀末開始提倡之時，即一步一步成爲與民族主義、種族意識親近的學門。期間雖然經歷 14 年的威瑪共和時期，但是民主制度與民主理念的實踐，正是提供與保障學術思想的多元性，而非

⁸³ Hans-Henning Scharasch, *Die Ärzte der Nazis*, p. 25; 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pp. 50, 71, 74-75.

打壓或清算。因此已呈偏頗的種族衛生觀念，在民主時期得以安然存在，進而與納粹更激進的種族意識產生連結。納粹時期種族淨化的作法，只是這些初期提倡者想法的接棒、傳承與極端化。優生的理念，在納粹手中徹底落實為毫不保留、毫無妥協的種族清除行動。

試圖將人類多元而複雜的生理與精神層面，分析簡化為最簡單的計量，並裁判人的存在價值，進而處理之，這可能不只呈現在種族衛生的理念中，而是普遍存在於整體近代西方自然科學中的負面性質。或許普羅茲真的曾於1940年過世之前，不滿猶太人在東歐被殺害而向納粹抗議，因為他並不反猶，納粹的種族淨化行動絕對不是他所想像的種族衛生之實踐，但是情勢已不可挽回，科學的負面性質已原形畢露，佔據世界舞台。⁸⁴德國醫學史家鈞特·曼(Gunter Mann)曾批判：「這些迴避人性之人，開啓了粗野的非人性之大門。他們不必為他們原本良善的立意而認錯，因為恐怖攝人的影響，以及他們簡化的思考，就已經確立了對他們的審判。」⁸⁵

⁸⁴ 藍茲的兒子Widukind Lenz在1980年代接受訪問時表示，普羅茲在1920年代即與希特勒接近，但是老年時曾抗議東歐猶太人被殺，因為他出生於東普魯士地區，對於東歐有地域情感，他甚至退還自己的納粹黨證，因為他不能想像這種形式的種族衛生。Benno Müller-Hill, *Tödliche Wissenschaft. Die Aussonderung von Juden, Zigeunern und Geisteskrank 1933-1945*(Hamburg: Rowohlt, 1984), p. 123.

⁸⁵ Gunter Mann, "Biologie und der 'Neue Mensch'. Denkstufen und Pläne zur Menschenzucht im Zweiten Kaiserreich," in Gunter Mann and Rolf Winau, eds. *Medizin,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das Zweite Kaiserreich. Vorträge eines Kongresses vom 6. bis 11. September 1973 in Bad Nauhei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7), p. 188.

徵引書目

(一) 論文與專書

1. Baader, Gehard. "Rassenhygiene und Eugenik – Vorbedingungen für die Vernichtungsstrategien gegen sogenannte 'Minderwertig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leker, Johanna. Jachertz, Nobert. eds. *Medizin im Dritten Reich*, Köln: Deutscher Ärzte-Verlag, 1993.
2. Grotjahn, Alfred. *Die Hygiene der menschlichen Fortpflanzung. Versuch einer praktischen Eugenik*, Berlin, 1926.
3. Kaiser, Jochen-Christoph. Nowak, Kurt. Schwartz, Michael. eds. *Eugenik, Sterilisation, "Euthanase": politische B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95-1945.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Buchverlag Union, 1992.
4. Kaupen-Haas, Heidrun. Saller, Christian. eds. *Wissenschaftlicher Rassismus. Analysen einer Kontinuität in den Human-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9.
5. Kühl, Stefan. *Die Internationale der Rassiste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internationalen Bewegung fü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m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7.
6. Lenz, Fritz. *Menschliche Auslese und Rassenhygiene (Eugenik)*, München: J.F. Lehmanns Verlag, 1931.
7. Mann, Gunter. "Biologie und der 'Neue Mensch'. Denkstufen und Pläne zur Menschenzucht im Zweiten Kaiserreich," in Gunter Mann and Rolf Winau, eds. *Medizin,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das Zweite Kaiserreich*. Vorträge eines Kongresses vom 6. bis 11. September 1973 in Bad Nauhei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7.
8. Müller-Hill, Benno. *Tödliche Wissenschaft. Die Aussonderung von Juden, Zigeunern und Geisteskrank 1933-1945*, Hamburg: Rowohlt, 1984.
9. Ploetz, Alfred.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Ein Versuch über Rassenhygiene und ihr Verhältniss zu den humanen Idealen, besonders zum Socialismus*, Berlin: Fischer, 1895.
10. Ploetz, Alfred. *Ziele und Aufgabe der Rassenhygiene*, Referat erstattet auf der XXXV. Tagung des Deutschen Vereins für öffentliche Gesundheitspflege zu Elberfeld, Braunschweig: Druck von Friedr. Vieweg & Sohn, 1911.
11. Proctor, Robert N.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 Rissom, Renate. *Fritz Lenz und die Rassenhygiene*, Husum: Matthiesen, 1983.
13. Schallmayer, Wilhelm. *Brauchen wir eine Rassehygiene?*, Leipzig: Verlag von Repertorienverlag,

- 1916.
14. Schallmayer, Wilhelm. *Vererbung und Auslese. Grundriß der Gesellschaftsbiologie und der Lehre vom Rassedienst*, Jena: Verlag von Gustav Fischer, 1918.
 15. Scharsach, Hans-Henning. *Die Ärzte der Nazis*, Wien: Verlag Orac, 2000.
 16. Schleiermacher, Sabine. *Sozialethik im Spannungsfeld von Sozial- und Rassenhygiene: der Mediziner Hans Harmsen im Centralausschuß für die Innere Mission*, Husum: Matthiesen Verlag, 1998.
 17. Schmitz-Berning, Cornelia. *Vokabula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8.
 18. Schmuhl, Hans-Walter.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2.
 19. Schmuhl, Hans-Walter. "Rasse, Rassenforschung, Rassenpolitik an das Thema," in Hans-Walter Schmuhl, ed. *Rassenforschung a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vor und nach 1933*,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3.
 20. Schmuhl, Hans-Walter. *Grenzüberschreitungen. Das 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Anthropologie, menschliche Erblehre und Eugenik 1927-1945*,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5.
 21. Weingart, Peter. Kroll, Jürgen. Bayertz, Kurt. *Rasse, Blut und Gene. Geschichte de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
 22. Weiss, Sheila Faith. "German Eugenics, 1890-1933," in *Deadly Medicine. Creating the Master Race*,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04.

(二) 期刊論文

1. Grober, J. "Ein Praktischer Versuch in der Rassenhygiene (Maori auf Neuseeland),"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3:VI (1906).
2. Lenz, Fritz. "Zum Begriff der Rassenhygiene und seiner Benennung,"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4(1914-1915), pp. 445-448.
3. Lenz, Fritz. "Zur Rasse- und Rassenwertung,"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4 (1914-1915), pp. 500-501.
4. Pearson, K. "Über den Zweck und die Bedeutung einer nationalen Rassenhygiene (National-Eugenik),"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5: I (1908).
5. Ploetz, Alfred. "Vorwort. Unsere Ankündigung,"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1:I (1904), pp. III-VI.
6. Ploetz, Alfred. "Die Begriffe Rasse und Gesellschaft und die davon abgeleiteten Disziplinen,"

-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1:I (1904), pp. 2-26.
7. Ploetz, Alfred. "Der Begriff Rassenhygiene und seine Abgrenzung und Einteilung,"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3:VI (1906).
 8. Ploetz, Alfred. "Erläuterungen über die Ziele der Gesellschaft für Rassen-Hygiene," *Der früheren Denkschrift 4, veränderte Ausgabe* (1911), pp. 1-8.
 9. Pösch, R. "Rassenhygienische und ärztliche Beobachtungen aus Neu-Guinea,"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5:I (1908).
 10. Schallmayer, Wilhelm. "Zum Einbruch der Naturwissenschaft in das Gebiet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1:IV (1904), pp. 586-597.
 11. Schallmayer, Wilhelm. "Zur Bevölkerungspolitik gegenüber dem durch den Krieg verursachten Frauenüberschuß,"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einschließlich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Hygiene*, 6(1914-1915), pp. 713-737.
 12. Weiss, Sheila Faith.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OSIRIS*, 2nd series(1987), pp. 193-236.
 13. Woltmann, Ludwig. "Ziel und Aufgabe der Politische-anthropologische Revue," *Politisch-Anthropologische Revue. Monatsschrift für das soziale und geistige Leben der Völker*, I:1(1902), pp. 1-2.
 14. Woltmann, Ludwig. "Arier- Germanen- Rassenpsychologie," *Politisch-Anthropologische Revue. Monatsschrift für das soziale und geistige Leben der Völker*, IV:7 (1905), pp. 379-388.
 15. Woltmann, Ludwig. "Grundfragen der Rassenpsychologie," *Politisch-Anthropologische Revue. Monatsschrift für das soziale und geistige Leben der Völker*, VI:2 (1907), pp. 97-102.

The Eugenics of the German Nation: the Beginning of the German Racial Hygiene

Wu, Pi-w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In the middle 19th century eugenics was a new science in Europe.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cientific technology many eugenists hoped to create or to breed the best human race. In the 1890s Alfred Ploetz, who was the first scientist in Germany enthusiastic called for this new science. Ploetz created a new term Rassenhygiene (racial hygiene) to replace Eugenik. It showed his great ambitions, Germanization of eugenics.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German racial hygiene. Until the 1920s Ploetz and many other founders of racial hygiene were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German national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With great anxiety about the “degeneration of Germans”,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in Germany and many other social problems they tried to find the ways to improve qualities and quantities of the German race. A distinct affinity between the eugenics ideology of racial hygienists and the racial ideology of the Nazis was emerged. In Nazi Germany the racial hygiene was not only a scientific ideology but also a real political policy, which attempted to ‘cleaning’ all human races.

Keywords: racial hygiene, negative eugenics, degeneration, Alfred Ploetz, Wilhelm Schallmayer